

拉斯基政治思想的背景

鄭文海

拉斯基生於一八九七年，死於一九五一年。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註一），因之，他所汲取的思考資料，決不限一地一隅。研究他思想的人，不能單從某一學校的學風或某一學派的體系來說明他思想形成的過程。在他的一生之中，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一次蘇俄的共產革命，三次法西斯式的政變，真可說是多變的世局。以他那樣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人，生在這樣的世局，宜乎激動憤慨而不可自己了。研究他政治思想的人，似應着眼於此，則對他的思想，或更能有深刻的認識。茲就拉斯基的家庭，拉斯基的個性及為人，拉斯基的教育及師承，拉斯基的時代來作分別說明。

一、拉斯基的猶太家庭

拉斯基先世乃波蘭猶太族，因受宗教迫害而遷居英國孟却斯特。他的父親經營棉花生意，頗稱富有，為該地猶太人的領袖。猶太人在英國，雖未十分受到歧視，惟因宗教及生活方式特殊，仍未能完全融入英國社會之中。因此，少數民族的感覺，仍未能完全消除。從拉斯基來說，他從小胸襟濶大，很少自卑感，因之很少提到或想到他的猶太籍貫，但是他的祖籍，在他的生命史中還是常常引起波瀾的。

拉斯基是長子，他父母雖然極為慈愛，但堅持猶太教的傳統，要他們的子女無條件的接受，這對敏感的拉斯基來說，自然是不很容易忍受的。到他十八歲的時候，他與長他八歲的佛麗達 Hilda 戀愛，而且私下在蘇格蘭結婚。這使他與家庭之間的關係，一度陷於決裂。拉斯基夫人是熱情而極有思想的女性（註二），拉斯基常因她而自傲。但從他的家庭來看，佛麗達不是猶太人，不信猶太教，拉斯基選擇這樣的伴侶是辱沒家聲的。他父親甚至以不供學費為威脅來阻止這件婚事，拉斯基此時初入牛津大學，本獲有獎學金，因父親主張轉讓給貧苦的青年而放棄，現在他父親却以停止供給學費來作脅迫，自然使他不滿。最後的解決，他父親允許以二百鎊完成他的學業，於佛麗達改宗猶太教前，不許年青的夫婦回家，以至佛麗達不得不

仍回蘇格蘭執教，而他於大學畢業之後，又不得不立即找尋職業，以謀組織家庭和維持兩個人的生活。他接受加拿大麥克賓爾 McGill 大學講師的聘約，其時僅二十一歲。他父親雖代購船票，却以到校後立即償還為條件。

這是拉斯基第一次感覺他為猶太人的不幸。一向愛他的父母，竟因種族偏見及宗教陋俗而忍心迫害兒女！他從此發展了反抗威權的個性，並更深入的研究各種威權所由建立的基礎。他對猶太人偏狹的成見，始終抱着同情的態度，他於深受父母迫害之後，曾寫過一部沒有出版的自傳式小說（註三），詳述猶太人既無祖國，嚴禁種族通婚及堅持陳舊傳統乃成爲一種自衛心理。猶太父母的對待其子女有時固顯得殘暴，但這種殘暴行爲的後面，却隱伏着久遠的被迫害的經驗。

不久之後，拉斯基自加拿大轉美國哈佛大學任教（註四）。在哈佛的數年之中，拉斯基得到不少益友，如霍爾姆斯 Holmes，佛蘭克福特 Frankfurter 等，均於此時建立深厚的友誼。霍爾姆斯有進步的法律思想，爲美國法律學家的老成碩望；佛蘭克福特於新政時代爲大法官，並且是羅斯福總統的智囊之一，他們都深刻的影響了拉斯基對法律的認識。拉斯基於此時並展露其驚人的才華，寫了好幾本飲譽學術界的著作。他們夫婦曾合譯狄驥的鉅著，近代國家的法律，又合校反抗暴君論（註五），而主權的問題（一九一六）及近代國家威權（一九一八）亦陸續問世。他參與新共和 New Republic 的編輯（註六），與其主編克羅來 Croly 且成爲莫逆之交。克羅來主張美國總統應有堅強的領導權。這個觀點，拉斯基甚爲折服，以後他寫美國的總統 American Presidency 一書時，即以這個觀點爲中心。拉斯基對民主政治的看法，實亦以此爲經緯。他認爲民主與效能是不相違背的原則，而欲民主有效，則民主國家的議會應以批評及討論爲原則，而行政的堅強領導，却是效能的象徵。

拉斯基在哈佛的惟一消遣爲逛馬立斯 Maurice 所設的舊書舖，在古書舊紙堆裏尋幽探勝，每有所獲，輒喃喃自語，如醉如狂的歡樂，簡直無法形容。反抗暴君論的舊譯本，就是他此一時期所獲的珍品。他每週授課九小時，此外尚須指導學生作論文，每深夜縱談，不以爲倦。他非常滿意哈佛的教書生活，若非波斯頓警察的罷工事件，他很可能長留哈佛，過着和平的學者生活，那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恐又非現在可比了。但警察罷工事件發生了，拉斯基又因見義勇爲而聲援警察了，由是

引起哈佛同仁及波斯頓士紳的不滿，有的且建議羅偉爾校長 Lowell 解聘，羅偉爾雖以學術自由為理由而拒絕這種建議，拉斯基當然還是深感不快的。更不幸的是：學生刊物以反猶太為口號來攻擊拉斯基，這是他第二次因猶籍而受到感情的傷害。此一事件對拉斯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常認為有產者的安全受到損害時，他們就會不顧一切的以維持秩序為其首要任務，這就是指波斯頓士紳的咆哮而言的。

其後希德勒執政，德國以反猶太的口號來恢復雅里安族的自尊心，拉斯基不僅要協助逃亡的猶太學者獲得安定生活，並須呼籲國際輿論正視這一個狂暴的舉動。拉斯基並不因為他是猶太人才這樣做。對於不合理的威權，他都是指斥不遺餘力的。不過納粹黨喪心病狂的行動，確亦引起他物傷其類的感覺。他厭惡希德勒的程度，較諸莫沙列尼為甚，這亦許是很重要的原因。

從這許多事實來看，猶太籍對拉斯基的政治思想是有其作用的。拉斯基常常認為社會中的少數份子 *Minorities* 是被迫害者，他的同情心，總是為這種人而發的。

二、個性及為人

(一) 熱 情

拉斯基有豐富的同情心，強烈的是非感，但缺少實際政治家調和及妥協的能耐，這使他在處世及思想上都受限制。

人們常常舉拉斯基同情弱者的故事。上文已提過他陷入波斯頓警察罷工事件旋渦的經過，而回英國以後，又為學生除名事件與政經學院當軸鬧得不歡。他任福萊區 Fulham 市參議員及勞工法庭仲裁委員時，博物院廁所清潔夫要求加薪每星期五先令，他主張給予十五先令，法庭則判給十先令（註七）實開加薪史的創例。至於他沒有實際政治家的才幹，那也是熟悉他的人的共同了解。他曾當面說阿特里是第二流政治家，應退讓賢路（註八）。這種直言不諱的作風，常使當其事者狼狽不堪。他從不知妥協為何物，凡是認爲是的主張，總要求他人接受，縱使環境絕不許可，他亦堅持已見，大有寧為玉碎，不作

瓦全的氣概。

拉斯基所以有這樣的個性，很可能受了猶太籍的影響。猶太人是少數民族，因之幼時常有受迫害的感覺，所以易於養成反抗的習慣。心理學家稱反抗爲求報償的行爲，這在拉斯基是可以得到證明的。我人於此不欲詳述同情心與反抗壓迫兩種行爲之間的關聯，而祇想從拉斯基的同情心來解釋他思想形成的過程。拉斯基因富有同情心，因之始終認爲弱者沒有得到公平的待遇。這是富有同情心者很容易有的想法，而拉斯基之所以成爲工黨的激進份子，與這個觀點很有關係。仔細分析，弱者與公平待遇的問題是並不簡單的。世之所謂弱者，多數指沒有財產或待遇菲薄的人，而自近代工業興盛之後，弱者更是後一種人的代名詞，工業社會之中，握有田地房屋等有形財產的人愈來愈少，而且這一種人在經濟界中亦並無操縱的勢力。絕大多數人成爲薪水階級，而他們之間的不同祇是月入多寡的差異。從這個觀點來看，勞工是否爲月入最少的一種人？是否爲社會中的弱者？在不同的國家中有不同的答案，並不能一概而論。而一般的趨勢，勞工的待遇逐漸提高，並不一定是社會中的弱者。

至於勞工會否得到公平的待遇？那更非一言可以作答，因爲勞工祇是各種職業工作者的統稱，而各種職業工作人員的待遇並不相同，亦是有的優厚有的菲薄。這種待遇上的差別，事實上又並不能視爲不公平的。拉斯基並不主張相等報酬（註九）。他說：報酬的差別而無理由可說者，始是不公平的待遇（註十）。那末勞工的差別報酬，是否皆無理由可說？姑以蘇俄爲例，它的工資由聯邦計劃局會商總工會而後訂定的（註十一），大體說，蘇俄聯邦計劃局常以國家的需要爲理由來定各業待遇的厚薄，凡國家認爲最重要而勞動供應較少的職業酬以高薪，亦有的時候，因保密的要求而酬以高薪，例如通譯人員皆負宣傳任務，乃能得到最高待遇。計劃局及總工會少數人能以國家需要這個空泛的原則任意來定各業的薪給，如果這個方式可以認爲不失公平，那末自由經濟之下的差別待遇就更理由可說了。工廠決定工資，必須要顧到勞工的供應數量，勞工所需要的訓練時間以及勞工本人經歷等等因素的。如此說來，勞工的所以得到他那份待遇，最少不是像拉斯基所說祇因爲他們不善選擇父母（註十二）。

上述分析，並不想證明現在社會中勞工已得到公平的待遇，更不是說自由經濟的社會完整而無缺陷。我們祇是說現代的社會問題及經濟問題不能籠統的以勞工爲弱者以及勞工沒有得到公平待遇等字句來作表達的。這種籠統的說法，不但容易使人發生錯誤的印象，而且也容易使問題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至於近代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因非這篇簡短的論文中所能說明，留待將來作討論。

(二) 過人的記憶力

拉斯基的稟賦，異於常人。他有驚人的記憶力，凡是讀過的書籍和論文，很少會忘掉出處，甚至還能記得頁數。作者親自有一次經驗，他指導研究英國文官制度時，告訴作者應該讀巴力門紀錄中某些委員會的報告書，並指出該等報告書在巴力門紀錄某冊某頁，及後作者翻閱，竟不爽毫厘。他的博聞強誌，早爲世人所公認，替他寫傳記的馬丁氏，也常常提到他這方面特殊的能力。

拉斯基的演講，雖無抑揚頓挫的聲調，但聽來總是引人入勝，令人神往。因爲他常用之不盡的軼聞遺事來強調他所講的主題。舉例來說，他曾認爲蘇俄很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由是他敘述會晤蘇俄司法部長的故事。他說這位部長本係扒手，因累犯而遭拘禁，由是在獄中研究法律，並因此而頗享法學界盛名，終且出任司法部長。他說會晤這位部長的時候，曾問優於學者是否會疏其技？殊料該部長當場表演，轉問拉斯基掛表是否尙在身上？一陣摸索之後，表已不翼而飛，正在警異之際，那位部長把表原璧奉趙了，原來妙手空空的本領，並不因擔任部長而退化。他說完這個故事，不但引起開堂大笑，而他的論點似亦得到了不可爭辯的證據。

拉斯基因爲有這樣驚人的記憶力，所以他很容易憑記憶中的資料來加強他主觀的認識，客觀求證的機會因之也比他人爲少。他要是沒有那樣好的記憶力，他思想中主觀的色彩亦許可以淡些。記憶力是學者很重要的條件，但對思想家來說，有時可能產生另外的影響。

(三) 犧牲自我

拉斯基一生從事教育，即使擔任工黨秘書長的時期，黨的工作異常繁重，但是他並不拋棄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書的責任。他擔任的功課經常爲日間部及夜間部各兩門，每門講演一小時。除此之外，他主持一討論班，所有他的導生都得參加。在討論班中，他常宣讀新著，師生之間，有時會引起激烈的爭辯。拉斯基的導生最多，自數十人至百人，因此他爲指導論文而化費的時間，比任何教授爲多。第二次大戰期間，政經學院日間部遷劍橋上課，而夜間部一度仍在倫敦維持。拉斯基常須往返於劍橋倫敦之間。他這樣僕僕風塵的生活，對他原非結實的身體是很有妨礙的。他沒有享大壽，過於辛勤的教育工作應該說是重要的原因。

拉斯基愛護其學生，可謂不遺餘力。他與學生談話的內容，自學術以至於私生活方面，無所不至。他的學生包括甚多的國籍，所以學生們回國後如何爲其祖國服務也常是討論的主題。拉斯基異常同情印度獨立運動，即因爲他常從印度學生方面獲知印度的實際情形。他以熱情及理想灌注其學生，尤其大戰期間，他對離校服役的學生總是加以鼓勵，要他們爲理想而戰，爲下一代的福利而戰。

不過認真的說，教育雖是他的終生事業，但並不佔據他太多的時間，因爲教書之外，他所須負責的事件還有很多。對工黨來說，他不僅是理論家，而且是實際活動的策劃人，他甚至還常須赴美赴法赴意做各種聯絡的工作。大選期間，他每日爲工黨作四小時以上的競選演說。他可以說是以小我全部奉獻與時代的一個人。他著作、教書、撰寫評論，參加政黨活動，而且在每一方面都是以全力來進行的。他很少休息，很少娛樂，幾乎每日工作十二小時以上。他所以這樣不愛惜一己的健康，無非受着一個理想的鼓舞，下一代應該比這一代幸福些。他由是把學生看作理想的繼承者，把工黨活動看作改造英國的必需途徑，把著作與時評看作教育人民大眾的工具，遂不惜竭盡精神全力以赴以爲之。他與麥唐納及阿特里里都有很深的交誼，但任何一次工黨組閣他都沒有閣席的要求，而且也從未作平民院議員的競選。從個人的旨趣來說，他選擇教育，事實上他亦從未離開教育，他的參與實際政治，決無名利之想，而祇是認爲知識份子對社會有其特殊責任而已。他是這樣的無私，任何以政治野心攻許他的人，實在是無的放矢。

拉斯基如能節省精力，不僅可以享高壽，而且學術上的成就必更為宏富。馬丁曾很客觀的說：拉斯基如果少寫一些，則其著述的影響必更為深遠（註十三）。他因常須為急就章，由是文不加點，很難得再予校閱，以至降低了他文章的格調。他後期的作品。雖仍雄辯滔滔，總不免「下筆不能自休」之病（註十四）。這是他急於為大眾服務，所以不措犧牲一己的令名了。他常說：「生命是極高貴的喚召 Life is a noble calling」，所以他從不肯浪費寸陰而以之全部奉獻與時代了。拉斯基是這樣的無私，就是他的政敵也不能不欽佩他這種偉大的人格。

三、教育及師承

拉斯基幼年進華蘭小姐 Miss Holland 所主持的私立小學。華蘭是一位極進步的教師，常率領學生參觀圖書館，市政廳、藝術館等。在街頭偉人的銅像之下，她即以為題材，進行歷史課程的講解。以後他進孟却斯德中學，校長白頓氏 John Lewis Paton，仁慈而好週濟貧困的學生，尤其注意猶太孩子的心理健康，對於宗教儀式及飲食等問題，盡量不使他們有何窘迫之感。拉斯基很欽慕這位校長，以後他對待學生的態度，可以說是受這位老師薰陶而得的。

拉斯基十八歲入牛津新學院，而且三年即完成碩士學位，這是一種非常過程。他的課外活動僅網球及參加辯論會，除此之外即沉默苦讀，多數同學都認為他過於孤僻，實則他正在狂戀中，而家庭的阻撓及經濟的封鎖，使他必須縮短求學的時間，所以幾以全部的精力貫注於功課。

新學院中，最使拉斯基心折的是梅忒蘭教授 Matland，他以梅忒蘭命名他惟一的愛女，可見他的孺慕之情，梅氏以翻譯葛克 Clerk 氏的中古政治思想史鳴於時，是一位初期的多元論者，與著教會與國家的斐祺氏 Figgias 齊名。除此之外，費喧 H. A. & Fisher 及巴干 Ernst Barker 的政治思想史一定對他發生很深的印象。巴干對他很親切，曾代他向其父母說項，希望勿因他的婚姻而妨害家庭的和睦。他又從維諾葛拉獨夫 Vinogradoff 及帕爾 Poole 習中古史。這兩位是當時著名的史家，對拉斯基的治學方法，一定很有影響的。

在拉斯基進入牛津之前，他得到佛麗達的鼓勵，曾受學於皮爾遜 Karl Pearson 氏，擬專攻優生學。皮爾遜很欣賞他的資稟，但在他獲得牛津獎學金後，即坦白的告訴他，智識的領域很為廣濶，勿以一時的興趣來限制自己。他應以全心全力致力於牛津的功課，可能在許多功課中找到更適合於他的終身學問。皮爾遜坦誠的指導，使拉斯基有轉向歷史作深入研究的決心。拉斯基不近數學，這是他放棄優生學的主因。

拉斯基對歷史有興趣並有極深的造詣，可從他在麥克祺爾及哈佛均授歷史一事識之。英國自柏克 Edmund Burke 以來，即以歷史為攻讀政治學的重要基礎，所以拉斯基以歷史為治政治學的入門，實沿襲英國的傳統。英國的史學，歷史哲學似尤重於考據，所以史學家往往即是歷史哲學家。亦因為這個關係，英國的歷史方法與哲學方法是沒有重要差別的。即以梅忒蘭而論，既可說自中古史的研究而得到多元的觀念，也可說以多元的觀念治中古史。根據歷史哲學寫歷史，有近於吾國的史論，以史家的中心思想為一貫的線索，歷史顯得異常完整。考據的歷史則易於支離破碎，令人常生祇見樹木不見森林之感。清人於考據之學極盛的時期，也曾有「鄙儒博學，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精於訓話，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意」的話來痛自檢討（註十五）。

英國治政治學的方法，既以歷史為其基礎，而牛津又為保持此傳統的古老學府，拉斯基於此受薰陶者雖不過短短的三年，但對他的治學方法却發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尤其是那種重視歷史哲學的態度，常使拉斯基特別強調某些事件的重要性，而對另外的許多事實，真會視若無睹，由是歷史哲學可能成為歷史偏見。

舉例來說，拉斯基常假定納粹運動為資本主義最後爭持政權的一種手段。這純粹是從唯物史觀推論出來的法則，他很少舉事實來作證明。拉斯基亦許會這樣說：納粹運動的經費何從而得？還不是出於有產者的資助？有產者借希特勒的暴力以推翻魏瑪共和，這是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獲得政權的歷史意義。拉斯基這一種辯證如可採用，則蘇俄的共產革命也可以說是有產者爭持政權的一種手段了，因為列寧也常從有產者方面獲得資助的。

拉斯基雖以唯實主義者鳴於時（註十六），但理想主義的色彩異常濃厚，這是他深受哲學方法影響之故。他說國家的宗

旨在滿足人人的欲望，這可以說是唯實主義。但所謂人人的欲望，貴乎不背於公善，這又可以說是理想主義或唯理主義了。他經常先標出唯實主義的旗幟，而後又以唯理主義來加以調和。即如上述的國家目的論，他先強調個人滿足其欲望的重要，因之國家僅有職能 Function 而並無其本身的目的。因之他又說國家對個人是否有益，應由個人本一己之經驗來評判國家的貢獻；因之他才可以把國家與其他社團處於同一水平，而主張各以服務爭取人民對他們的忠順。這是他的多元論，也是他從唯實主義的觀點出發而得到的結論。但人人的欲望互殊，而且也可以因之而引起無窮盡的衝突，他雖不怕國家陷入無政府的状态（註十七），但無政府狀態究竟祇是人自為戰的局面，在這種局面中不可能使人人幸福的。所以他必須又提出公善，使人人的自私有其自律，自私與自律。是兩種矛盾的觀念，而拉斯基乃兩取之。他所以陷於矛盾而不自覺其矛盾，可有幾種解釋。其一借羅素批評邊沁時所說的話（註十九），拉斯基天性善良，他的自利心皆無害於人，所以他認為自利與公善是不相違背的。其二是拉斯基的思想之後，常以歷史哲學為其基礎。早年他受顧林的影響而不知不覺中以康德的歷史哲學為基礎，中年以後則有意以馬克斯唯物史觀為基礎，所以總是認為矛盾可以統一。

我人於拉斯基歷史方法的師承問題言之稍詳，因為這對於他思想的傾向是極有影響的。我人常謂英國人很少接受美國式社會科學方法的影響，故不易脫離歐洲大陸的傳統。以拉斯基而論，他如接受芝加哥學派的影響，他思想的內容一定會大起變化的。

除上述英國近代學者之外，拉斯基亦很受美國學者的影響。他與霍爾姆斯及法蘭克福時交往的情形，已於上文提及，茲不復贅。所可述者，霍爾姆斯及法蘭克福時雖係社會法學者，他們對法律的看法，頗近法國的狄驥，而與英國梅忒蘭等亦有淵源，所以他們的觀點，祇加強了拉斯基的自信，很少有修正的作用。而且哈佛此時的風氣，極力想擺脫德國的影響，以是採用牛津式的導師制，而於本國的新方法，反而沒有加以注意。

一位思想家所師承的，當然不僅僅以接觸的師友為限，多數經過他精讀的著作，左右他思想的力量亦很深遠。在拉斯基的著述中，不難看到前人思想留在他腦海中的痕跡（註十九），第一，顧林 T. H. Green 的新唯心主義，恐怕是形成拉斯

其權利哲學最重要的一個人。拉斯基的著述，處處流露着個人本位的基本看法。他認為政治的終極目的，當為使人人得以完成其最善的我（註二十），此種見解，與格林者初無二致。拉斯基常用嚴厲的語氣批評唯心主義，亦許有人認為他的思想與唯心主義是絕端相反的。殊不知他理想主義的色彩極為濃厚，對個人在政治中的地位又絕端推崇，因此很不容易擺脫新唯心主義的觀點。

當然，拉斯基的權利哲學，與顧林者亦有區別，並非無條件的予以接受者。甲、拉斯基重視工作權及受教育權，這是顧林所沒有提到的。乙、顧林的權利與倫理的義務相配合，故賦國家以剷除倫理的障礙之權。而拉斯基則不信任代表國家的政府，雅不願政府有這樣龐大的權力。拉斯基祇允許政府以服務的成績去爭取人民的服從，不承認政府有先天的支配權與命令權。丙、顧林相信有公意，而權利的界限，公意可以為之決定，拉斯基不相信有公意（註二十一），故權利的內容，幾乎須由各人的經驗來作決定。因之，拉斯基個人主義的色彩，較顧林者更為濃厚。

我人常謂近百年來的英國政治思想，實以個人主義為基本精神。所謂新唯心主義，即是以英國的個人主義與德國的康德思想相調和。拉斯基的思想，又不過以顧林的個人主義與近代的社會主義相調和。最少拉斯基前期的思想，用這個方法來解釋是沒有什麼錯誤的。

上文已經說過，拉斯基根據顧林的觀點，認為個人雖求私利，但此私利總期能與公善相合。個人不能自外於社會，他的私利而有背於公善，終必為他人所棄，那他求利而反為受害了。什麼是公善？不外苦痛的避免與快樂的獲得。這許多說法，不啻為邊沁學說的翻板。可見邊沁又是拉斯基所師承之一人。今日工黨的福利國家觀，實亦是修正的邊沁主義，故拉斯基之以樂利為人生鵠的，並不可怪。拉斯基與邊沁不同的地方，即邊沁的苦樂，純係個人的感覺，不能分出善惡。拉斯基則自全社會的觀點來衡量苦樂，認為有的樂可以追求，有的樂不能追求。例如企業家雖以獲得高利為樂，但這種樂或則須壓低工人的工資。或則使消費者受高物價之苦，以是不能視為真樂。換言之，拉斯基認為苦樂另有價值標準，不純粹是個人知覺器官的感覺。拉斯基所以要有這樣的修正，一則要顧全他社會主義的立場，二則也是受了顧林思想的影響。由是可知拉斯基以顧

林思想去修正邊沁主義，亦可反過來說以邊沁思想去修正顧林主義。

於茲有一問題發生，邊沁的思想是否與顧林者根本衝突？若係根本衝突，拉斯基的調和工作豈不勞而無功？在一般的了解中，邊沁無主觀的道德，尚須以苦樂的多寡來定，樂多苦少者為道德。顧林則先有道德標準，而後問行爲的是非。邊沁雖非反道德，但因把道德看作結果，故道德非先天的原則 *A Priori theory*，與顧林之認為道德出自理性及道德先苦樂而存在者實大異其趣。今拉斯基揉之而熔於一爐，自然會時時自生矛盾。他論國家職務時要求國家尊重個人的經驗，論個人權利時要求個人行爲之勉合於公善，前一說是邊沁的思想，後一說是顧林的思想，由是個人行爲不能勉合於公善時，他就深感束手無策了。政治典範與國家的理論與實際所以會判若出諸兩個人的手筆，就是從這個矛盾發生的。中年之前，他相信個人行爲能勉合於公善，故強調國家無主權；中年之後，他又堅信資產者不肯讓步，而不肯讓步即是不肯合於公善，由是強調革命的政府應有絕對的權力。拉斯基思想的忽而溫和忽而激烈而極權，豈不都因沒有真正溶合邊沁的功利與顧林的倫理所引起？

從上述拉斯基的思想中，不難看出他又深受洛克及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的影響，尤其後者的絕對經驗主義，幾乎可說成是構成拉斯基思想的第三種因素。他論國家職掌時說應尊重個人的經驗，談自由權時說祇有在自由的條件下人人始能貢獻其經驗，論受教育的權利時說惟受教育者始有表達其經驗的能力。故經驗這個名詞，在拉斯基的著作中是常見的字眼。拉斯基既以趨樂避苦為福祉，而苦樂又究竟是個人感覺上的事情，他重視經驗，可以說在事理之中。但他又時時說到超經驗的公善。自個人的經驗如何達到超經驗的社會公善？他建議了許多方法，例如立法時多作民意的溝通，行政時多與有關人士會商，這都是政治制度上應作的改進，拉斯基的主張都是很為寶貴的。惟溝通與會商而仍不能得到社會公善時又將如何？中年之後，拉斯基深感現代是不易對公善有共同看法的時代，深信生活不同者思想亦不同，有產者與無產者對社會公善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由是悲觀絕望，以為武力革命為不可避免。他甚至把兩種尺度來衡量兩種人，以為有產者的經驗不足重視，重視有產者的意見即是政府受了他們的操縱；無產者的經驗必須接受，不接受無產者的經驗即為政府的專制。這種矛盾的觀念，可謂近代思想家的通病，固非拉斯基一人為然。

實則個人的經驗以至於超經驗的社會公善，必須下過推理的功夫；推理固須以經驗為參考而不能全憑主觀的成見，但亦未可全依經驗。不僅社會的公善須經推理，即個人的善，亦須經過推理。蓋經驗是經驗，善是善，從經驗到善，還有若干過程若干距離。以食解饑以飲解渴是人人都有的經驗，而不吃嗟來之食却是經推理後才能有的結論。政府立法與行政時應參考多數人的經驗，這是使立法者行政者勿自蔽其聰明的方法，但並不能就因此得到好的立法好的行政，因為經驗不就是善。若謂經驗即是善，那不接受無產者的經驗固不可，不接受有產者的經驗也不可，到那時政府將不知所適從，祇有武斷行事了。

到兩種人因不同的經驗而於公善不能有共通的看法時，這是理殊難明時代，當然會引起嚴重的不幸。不過真到達此一時代時，其解決的方法，應不是接受一方而拒絕另一方，因為與其作迎與拒的選擇，還不如參考兩方的經驗。

對拉斯基思想影響最大的，要推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拉斯基分析國家的性質，幾乎均為馬克斯的學說所左右，尤其一九三五年以後的著述，更覺明顯。他常常說國家與政府沒有區別（註二十二），所謂國家，都由政府包辦。這是他反對一元主權論的重要理由。至於政府，又不過統治者的集體名詞辭，而統治者的利害觀念，與社會中資產階級相同，而與多數貧苦大眾是很為隔膜的。「生活不同者想法亦不同」，這是他說明統治者不能謀公利的一句常用的話。因此種種，國家的法律，國家的教育文化，以至國家中其他用以約束人的習俗，無形中皆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觀點。拉斯基並不是說統治者個個自私，而祇是說統治者雖自信其所為皆福國民，惟因主觀的認識不同，故結果乃適得其反（註二十三）。

拉斯基更根據這個想法，解釋為什麼十九世紀的英國有保護勞工的進步立法？他說經濟擴張的時代，對勞工讓步不至於影響資產階級的基本利益，故容讓乃成為統治者的美德。惟經濟緊縮或勞工要求過高而足以妨害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時，統治者甚至會放棄民主的制度（註二十四），而以高壓的政策對待其人民。這許多都是拉氏習於馬克斯唯物論而一再重覆的言論。

根本的說，拉斯基雖深受唯物論的影響，但他不是共產主義者。他有幾個觀點與共產主義是相反的。第一、拉斯基始終

重視個人在國家中的地位，對共產集團摧殘人民的自由與權利的作風是不能同意的。他主張自由以平等為基礎，而不是說自由沒有麵包重要。第二、拉斯基雖批評資本主義的民主，但事實上始終相信代議是最好的制度。他對英國現有制度的改革建議，最多對英王及貴族院的存廢有意見，其餘則甚至地域的多數多代表制亦不主張改變（註二十五）。他認為現在英國的問題是大企業的國有而不在政府的制度，他一直堅持政府立法應多方容納人民的經驗，對拒人民的經驗於千里之外的共產黨專政制度，自然不會首肯。

唯物史觀在拉斯基思想中事實上顯得很不調和的。上文已經說過，拉斯基的思想中有濃厚的唯心主義的氣息在。他不相信個人的私利可以與他人者永久分離，故人人應以公利為其目標。人人能以公利為其目標，故自由與權利皆是個人得以發表其經驗的必要條件。從這個觀點出發，所以他又說資產階級支配着的政府必然會違害公利。但拉斯基重視權利時對人性所作的假定與批評政府權力時對人性所作的假定，有一不可通的鴻溝在。蓋人人能以公利為目標，則政府中人不能皆為桀紂；若政府中人必為桀紂，人民又何獨能不濫用其自由與權利？實則人既非完全理性，亦非完全反理性，而政府威權之所以必須維持並不因為政府中人人皆是聖賢，人民自由與權利之應得保障亦非因為人民個個富有理性。政府的權力以及人民的自由與權利，無非為相互制衡而設，人果能完全合於理性，政府權力與人民權利都是不必要的了。同時，人既非完全理性，權力與權利均可濫用，政治上如果出現弊端，不能說就是階級意識在作祟。

我人常謂拉斯基的思想，很受他治學方法的限制，就是指這種地方而說的。拉斯基如能對一九〇九年或一九二三年或一九三一年那幾個重要事件作案件的研究，他不會有過於籠統的斷語的。在政治權力的爭奪中，政客們所注意的不一定是階級利益，而是如何使自己獲得地位。自由黨與保守黨，或是工黨與保守黨，其領袖們固揣摩有力者的心理，但此地的所謂有力者，不一定指有產者，因為現代國家中，有產者提供的選舉票並不太多。即以邱吉爾而論，他所服務的是大英帝國國家的光榮，而決非為地主為貴族或為企業家效勞。以階級的觀點解釋政治，常會差以毫厘謬以千里。

以上所述，說明拉斯基除受牛津時代幾位大師的影響，又師承顧林邊沁詹姆士及馬克斯等人的學說，而且每一位的學說

，都會使他的思想發生不很和諧的作用。

四、拉斯基的時代

拉斯基所處的時代，乃廿世紀的前半期，凡其所感受，與現在還活着的老人大致相同。近半世紀中，世事演變之速，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不能與之比擬。十八世紀末葉的大革命，掀動世界狂潮者亦達半個世紀，處於那個時代的人，亦會像柔諾或伊壁鳩魯一樣，深覺人生若夢變幻莫測。不過十八世紀的思想界，多數為樂觀的理性主義所支配（註二十六），以是對變動望變動能加速度進行。

我們所處的時代不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大家所體驗到的是：戰爭雖告終止，戰前的問題却依然存在，並沒有因戰爭的結束而結束。更有甚者，大戰之後跟着來的經濟恐慌，失業者充斥於道，使人每有末日之感。生於此一時代，思想家自易為時代的潮流所左右。拉斯基的思想，政治典範之前的作品多數為學術的探討，心境甚為和平，而國家的理論實際之後，幾乎每一著述都是為世界或英國的重要事件而發，如民主的危機 *Crisis of Democracy*，我們時代的困擾 *Dilemma of our time*，論衡我們這一時代的革命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等均是，以是作者的期望與失望，無不形諸筆墨。時代對他的影響，更是顯而易見。

(一) 一九三二年前

第一次大戰爆發時，拉斯基尚在牛津讀書。大戰接近結束階段，他赴加拿大教書，其後又赴哈佛，在這幾年之中，他似乎祇努力於學問，對世局沒有過分關切。就是俄國的波爾希維克革命，他雖然注意它的發展及考慮它的意義，但未嘗因之而失去心理上的平衡。此後曾陸續發表小冊子，如一九二一年的馬克斯 *Karl Marx*，一九二七年的共產主義 *Communism*，以及在費邊刊物中所登載的社會主義與自由 *Socialism and Freedom*，都表明他對馬克斯主義及共產革命的基本看法

。他說馬克斯的價值論是不值得費太多的時間去研究的，因為它實在經不起考驗（註二十七）。他亦充分了解馬克斯主義無法容納民主主義。而自共產革命之後，人類必須在革命與改革中競賽（註二十八），而他是傾向改革的，因為革命使用暴力。總之，他同情社會主義，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應當同時是自由主義（註二十九），一九二二年以後所陸續發表的文字，說明這位年青學者並未忽略世局，而經過他成熟考慮之後，他選擇了自由民主之道。

一般的說，拉斯基留美期間純粹過着學者的生活，對英國的政治相當隔膜。思想方面，似乎仍在消化牛津時代所接受的知識，故在哈佛期間的著作，梅忒蘭、斐琪等人的影響是極為顯著的。

一九二〇年，拉斯基回英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教，華萊士退休後，即繼之為教授，從此雄據講壇，以迄謝世。他在教室中所得世界各國智識青年的愛戴，決不遜於他多產的著述。不久，他加入工黨，與英國政治結不解之緣。拉斯基常以英國工會能建立工黨而自慰。這在他寫的美國政府書中充分流露出來的。他說美國的工會祇是壓力團體，始終以提高工人待遇為務，未嘗能有自己的主張，深以為憾（註三十）。不過拉斯基亦常為英國工黨的命運而悲嘆。尤其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二九年兩次組織少數政府，皆未能久安其位，亦未能施展工黨的黨綱，這是他深深不滿於英國制度的一點。

他常說貴族院的擱置否決權 *Suspensive Veto* 對工黨的打擊十分嚴重。而英王久未運用的特權，如任其死灰復燃，對工黨的政權更會十分不利。他甚至對平素極為愛好的英國文官也表懷疑，認為文官多數出身華族，對工黨的政策不會忠實執行。這種懷疑及批評的態度，恐非拉斯基一人為然，工黨其他的思想領導者，大多抱着同樣的觀點。（註三十一）

拉斯基此時雖已介入政治，但他與一般費邊社會主義者的觀點相同，和平革命是英國正當的途徑。戰後工黨發展甚速，而自由黨內部的分裂更增加了工黨在平民院中的地位。分析社會真相，提出社會問題，以此教育選民，工黨自能水到渠成起而掌握英國的政權，到那個時候，工黨自可以巴力門的立法來實施工黨的政策，這是費邊主義者重要的政略。按諸當時工黨發展的情形，似乎這個觀點是很為正確的。一九二三年工黨初次得到組閣機會，雖不久夭折，拉斯基猶認為此乃初顯身手者常有的遭遇，而且工黨以少數派組閣，事事受有牽制乃事理之常。拉斯基這一種樂觀的看法使他能平衡的心理中完成其一

代巨著——政治典範。拉斯基多少改變了初期多元主義的論調，認為社團與國家的地位，應同時加以節制。而更強調個人權利的重要性。卡脫林教授評論此一時期拉斯基思想曾說：「拉斯基是道德的唯心論者，兼有唯心主義的優點及缺點（註三十二）」，可謂至論。

許多人認為拉斯基的思想從未定型，這是皮相之談。他始終沒有拋棄政治典範中的基本觀點，例如職司權利說即為其中之一。他後期思想的所謂轉變，祇是在手段上徘徊於和平革命與暴力革命之間，初未嘗欲否定其權利的學說。他對民主的理想也一樣的執着，有一時期他雖認為民主的制度不足以實施他的理想，但一有和平革命的機會，他立刻回復原來的主張，不以獨裁制度為然。

（二）一九三一年的打擊

一九三一年的事件對拉斯基的理想以致命的打擊，他以激烈思想家聞名於世，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該年麥唐納因不能收拾黃金風潮而辭職，可是進見英王之後，却又宣佈組織國民內閣，與保守黨及自由黨聯合，俾渡過英國的經濟難關。此一事件，使拉斯基異常氣憤，以為麥唐納為着一己的名位，不惜犧牲同僚，亦不惜犧牲他所領導的羣衆。

拉斯基深愛民主，而且堅信在民主政治的正常運用之下，工黨祇要得到選民的信託，即可以和平地實施其政綱。但擺在眼前的事實，工黨雖能執政，却未能施政，而且在最緊要的關頭，叛變者還是工黨的首領。這使他不得不回頭去看馬克斯對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評論，而開始懷疑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在拉斯基的思想中，對威權本來抱有反感，而於統治者為全國人民謀福祉的誠意本不肯予以信任。麥唐納的行為又加強了他這方面的信念。更兼當時英美法德的經濟恐慌都相當嚴重，更使他記起馬克斯資本主義自己崩潰的預言。由此種種，他認為必須對自己所抱的政治理想再加檢討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他於國民內閣聯合陣線大獲全勝後致書法蘭克福特時曾說：「政策固應由民選政府決定，抑由政府以外的金融鉅子決定？如由後者，那社會主義不可能依憲法手續進行，而波爾希維克的路線為不可避免了。我的立場業已決定，矢為工黨的左翼，必要時且為極左分子！」這是他當時的憤極之言。此後即陸續寫了民主的危機，國家的理論與實際，以

及英國巴力門政府等書，都是他對一九三一年事件的反應。

在民主的危機一書中，他認為工黨如再獲政權，應要求巴力門授權，得以命令施政，以暫時停止在野黨的阻撓作用，這是拉斯基私人的觀點，並不代表工黨的意見。克力浦爵士曾因堅持此一提案而被開除黨籍，可見工黨的中執會是反對此一觀點的。拉斯基的主張，事實上是他此後積極反對的希特勒所採取的策略，他應該會看到此種策略所加於民主的災害為如何。「國家的理論與實際」一書，說明十九世紀以來所以有許多革新，都因新興企業家利潤優厚，稍作讓步不至於影響他們在社會中的領導地位，由是充分表現了容讓精神，自由主義乃揚溢為那一時代的精神。惟時至今日，英國的企業已發展至其極限，而勞工的要求，已至組織政黨而數次獲得組閣權了，又足以推翻資產階級的領導地位。由是資產階級拋棄他們所創導的自由主義，無所不用其極的以最後手段打擊工黨。到這種時期，工黨應憬悟革命不能再在和平的方式中進行，因資產階級已不復能表現其容讓的精神了。

拉斯基並以同樣的公式分析意大利德國以及西班牙的法西斯式的政變。他最初未嘗不知道這一種分所是極為武斷的，因為這種說法過於把問題簡化了。心理方面的因素，事實上是非常複雜的（註三十三）。試想意大利德國西班牙與英國的經濟條件完全不同，而莫沙列尼希德勒法朗哥的爭奪政權與麥唐納保持首相地位並不出於同一動機。而且二十世紀的歐洲國家是否都已到了經濟發展的極限？是否企業家稍作讓步即足以妨害他們的基本利益？是否政治變動中真有企業家在作幕後策動？對於這許多問題，他如肯一一作事實的觀察，他一定不會這樣驟下斷語了。

國家的理論與實際，可以說是拉斯基唯物史觀之下的國家性質論，而其主要的宗旨，更在說明經濟恐慌為資本主義沒落時必然會發生的事件，當時倫敦的黃金風潮，又為資本家傾覆社會主義政府的陰謀。其實那時英國經濟學者對經濟恐慌都有解釋，如陸賓斯（L. Robbins, *The Great Depression*, 1934）認為祇是過分投資的結果，凱恩斯又從就業的觀點來作分析，認為失業與購買力的喪失實為不景氣的主要原因。拉斯基皆不願予以參考，這是很可惋惜的事情。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英對德宣戰，這使拉斯基的思想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因為戰爭給予他以和平革命的新希望，宣戰的翌日，他即致書羅斯福總統，認為美國更應致力於新政，庶戰後的世界得一示範。他在工黨代表大會的演說，強調戰時的計劃經濟，可以為戰後的社會主義立一基礎，故戰爭對社會主義有益。邱吉爾出任首相之後，工黨允許參與混合內閣，成立了政黨休戰的諒解，拉斯基對這許多新的發展，大體上都認為滿意的。

不過在討論戰爭目標的時候，拉斯基的理想主義固不能為邱吉爾所接受，就是工黨的領袖以至他的美國朋友，都未能與他一致。拉斯基希望以社會主義為戰爭的目標，藉以堅定英國人民的戰爭意志，邱吉爾認為目前應以勝利為惟一鵠的，至於戰後的建設綱領究應為自由經濟抑為社會主義，應由選民決定，不能在戰時自分壁壘（註三十四）。而工黨領袖阿特里認為混合內閣原非工黨一黨所主持，不能強人所難，把一己的主張強迫其他政黨接受（註三十五）。拉斯基乃批評兩人皆缺少大政治家的氣魄，不能利用時機來奠定永久和平的基礎。

拉斯基的觀點所以與實際政治家有距離，實因邱吉爾與阿特里着眼於目前戰爭的勝利，而拉斯基則着眼於將來的和平建設。拉斯基之所以常被稱為理想主義者，就是為了這個原因。不過從拉斯基來說，他認為從戰時計劃經濟實施的經驗中，保守黨亦應知社會主義經濟為將來應走的途徑，兩黨如能有此共同認識，則兩黨應於此時宣佈共同目標以加強英國人民為公道而戰的決心。其實邱吉爾未嘗把戰時經濟看作社會主義經濟，所以他建議以社會主義為戰爭目標，邱吉爾是不能接受的。他因建議未獲接受而嚴厲批評邱吉爾，使美國朝野，大為不安。拉斯基的執着於理想，於此可見一般。

戰爭結束後，英國即進行大選。邱吉爾於出席波茨坦會議時，邀阿特里隨同前往。拉斯基以工黨主席的身份發表公開談話，認為阿特里祇能以觀察者的身份列席，凡非工黨中執會或巴力門委員會的決議，他不能有所承諾，這使阿特里相當狼狽。其後工黨獲勝，拉斯基訪問意大利時所作演講，也很使阿特里不快。拉斯基所以會有這許多行動，實因競選中備受保守黨中傷而激起。大戰期中，拉斯基的建議雖為兩黨領袖所拒絕，但在輿論界則甚受歡迎。大選期間，他的演說又受到熱烈的擁護，所以保守黨認為他是最有力量的得票人，對他乃盡力打擊，甚至在報紙中說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拉斯基雖向法院控該

報以誹謗罪，又遭敗訴，心緒的惡劣，可想而知。由是批評保守黨的反動外交；爲防止阿特里里爲其所俘，他又發表了那樣不合時宜的聲明與演說。

拉斯基此後寫了評衡我們這一時代的革命以及我們這一時代的困擾。最後的一本書係未完成的著作，經克拉克 R. T. Clark 整理而刊行者。這兩本書的基本觀點，認爲社會主義建設既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前進之道，則蘇俄的經驗未嘗無參考的價值。而蘇俄那一方面，也應了解西方民主制度之下對於人權保障的各種優點。兩者各去其短，則必大有裨益於世界的和平。換言之，拉斯基堅信經濟的民主是革命的目標，惟此項革命，應於政治的民主之上建立其基礎。他深憂此一理想的實現尙有極爲遙遠的路程，因爲政治民主的西方與「經濟民主的蘇俄」(?) 各有所蔽，事實上一天一天會走上衝突的邊緣。拉斯基沒有看到工黨施政以後的實際結果，因此他沒有看到握有政治權力的政府而兼掌經濟權力，不僅任務加劇，即決策的程序亦會逐漸失去民主的控制。巴力門與國營企業之間的關係如何？總經理們是否像部長那樣每日都須答覆巴力門的詢問？莫里遜認爲這是不可能的，因爲這樣會妨礙企業的效能。但巴力門却追問：那末是否經濟大權皆操諸經理之手而無須向人民的代表負責？這是國營政策之下必然會發生的難題。看到這許多實際問題以後，他亦許對經濟民主的定義也會有所改變，而對蘇俄經濟制度上的缺點，也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

(四) 世界局勢與拉斯基的思想

一九三一年之前，拉斯基早已關心世界問題，積極的謀世界秩序之建立。政治典範有一章專論國際組織，對第一次大戰後的國際聯盟深致其殷切期望。他詳細地自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社會的三方面來探討國際聯盟可能做的工作。他知道國際間的政治問題及經濟問題，往往涉及國家利害，非制裁不能爲功，可是一講到制裁，輿論譴責雖亦能發生若干作用，收效究竟不大。而經濟制裁與軍事制裁，很難希望會員國一致行動，故未易實施。雖然，國際聯盟如能對國際投資，國際移民，國際自然資源的開發以及疆界、條約、裁軍等重要問題作原則性的規定，最少可以逐漸產生國際的共同標準。對和平前途還是大有裨益的。社會問題的國際合作，拉斯基認爲是國際聯盟的最大希望。

一般的說，拉斯基在這方面的理想實以康德永久和平論為依據。

一九三二年，希特勒崛起執政，其時適麥唐納組織國民內閣，拉斯基乃以解釋英國政治的觀點解釋納粹黨所以得勢的原因，由是那一時期的經濟恐慌都成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那一時期的右傾獨裁皆成為有產者最後爭持政權的方法，他對於國際問題的看法也陷入馬克斯主義的公式之中。二次大戰以後，拉斯基觀點又有改變。在論衡我們這一時代的革命一書，他有論法西斯蒂主義一章，對莫沙列尼及希特勒所以得勢的原因，有極深入的分析。這本書是大戰之後寫的，其時德蘇訂立友好條約，使拉斯基對共產政權的陰狠面目有較多的認識，乃了解到唯物主義對國際關係的解釋是不很充分的（註三十六）。法西斯蒂主義之所以能成為力量，實由其有組織羣衆的技術與口號。如無羣衆的追隨，法西斯蒂主義是不足畏的。法西斯蒂主義均能利用民族主義，使戰敗國家（指德國）或戰爭中未能滿足（指意大利）的人民能得到鼓舞。它們都強調爭取生存空間，由是因整頓軍備而使失業者就業，並使人民有恢復強國地位的榮譽感。即使反猶太等極不合理的口號，也使侮辱猶太人或搗毀猶太商店者覺得做了件衛護國家利益的偉大工作。總之，法西斯蒂主義使被凌辱者深感揚眉吐氣，在心理上很大的報償作用。爲了這個關係，法西斯蒂主義的陣容中有無產者，有失業軍人，有小公務員，有無可依歸的智識份子。而且法西斯蒂黨之得以崛起，從德國的情形來說，又由於社會民主黨為共產黨所排斥，以至政府的基礎甚為脆弱。故共產黨的顛覆政策，對法西斯蒂主義的興起應負責任。這是一九三九年德蘇協定的教訓，使拉斯基認識上列事實。

不過拉斯基始終是爲東西携手而努力的一位思想家。即於德蘇協定成立之日，他已預言希特勒於西線略獲勝利之後就會東向而壓迫蘇俄，使蘇俄終於要與民主國家並肩作戰。民主國家果能表示以德報怨的容讓精神，對蘇俄可以發生很大的感化作用。拉斯基似乎沒有了解共產極權與法西斯蒂極權有基本類似之點，他們均視對外的擴張常是解決內部危機最好的手段。因之，民主國家是共產極權顛覆的對象，與之建立友誼是不可能的。上文已經說過，拉斯基常以自己忠厚的性情來測度事理，許多時候是要爲自己的感情所欺騙的。

拉斯基此時對世界安定的看法，與其謂依仗國際組織，不如謂依仗英美蘇三國的諒解與合作。但蘇俄終不可恃，所以他

最後的遺著——我們這一時代的困擾，不能不對世界前途表示隱憂。

總觀拉斯基的一生，始終為道德的理想主義奮鬥，雖受盡各種挫折，未嘗稍怯。他道德的勇氣，有為其他思想者所不能及者。他的思想，表面看常在變動，但實際的說，祇是道德的理想主義在不同環境的不同適應。他尊重人性，堅持各人的經驗皆能對國家這個大社會有所貢獻，這是他一貫的看法。

(註一) 拉斯基於一九二二年出版政治典範 *Grammar of Politics*，蕭公權先生即稱其斐然成家。一生著作，達三十七種，目錄附後，即以數量論，已可驚人。惟中年之後，因參與現實政治，所論皆有為而發，不經意於理論體系，遂有責其非思想家者。

(註二) 拉斯基夫人習優生學及節制生育，與拉斯基相遇時，任蘇格蘭中學教師。

(註三) 上帝的選民 *The Chosen People* 長達一百八十餘頁，敘述一猶太青年與異族女子戀愛的故事。

(註四)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〇年。

(註五) 反抗暴君論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為十六世紀作品原署名 Bruto 作，一六三九年英國有譯本，拉斯基得之於哈佛舊書舖中，乃有編訂印行，並為之序。

(註六) 拉斯基有意使之成為類似英新政治家之刊物。

(註七) Martin; Harold Laski 1953. PP107-108

(註八) 見同書一七七頁。

(註九) Laski: *Grammar of Politics*. P. 189

(註十) 拉斯基在多數作品中均表示報酬可以有差別，但差別必須有客觀的理由。

(註十一) Mr and Mrs Webb: *Soviet Russia, a new Culture?*

(註十二) 拉斯基常譏刺富人惟一的本領是善於選擇他們的父母。

(註十三) Martin 同書三四五頁。

(註十四) 拉斯基自己在 *what I Believe* 一文中說明思想家應為學術而學術，最好的政治作品，都是參與實政治的人所寫的。

(註十五) 桂馥會云：「近日學者，風尚六書，動成習氣；偶涉名物，自負倉雅，略講點畫，妄議斯冰！叩以經典大義，茫乎未之聞也。見清史列傳卷六十九，儒林傳下（中華書局版）。」

(註十六) 拉斯基常自稱是唯實主義者。

(註十七) 拉斯基常自問：我這種說法不將陷國家於混亂麼？他自答曰然，但國家寧可在有條件的無政府狀態Conditional anarchism 之中見。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註十八)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P. 805。

(註十九) 參閱蕭公權拉斯基政治思想之背景載清華學報七卷二期。

(註二十)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P. 24 unwin Books。

(註二十一) Grammer of Politics P.P. 30-35

(註二十二) 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3-25

(註二十三) 同書一一二至一一三頁。

(註二十四) 一九三一年以後拉斯基的著述中都有這樣的言論。

(註二十五) 政治典範中不贊成比例代表制，不贊成職業代表制，於柯爾的經濟國會亦認為難行。

(註二十六) 達隆員會誇耀他那一個世紀成就之大，可見大革命之前智識人士樂觀心理之一般。語見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註二十七) Karl Marx。

(註二十八) Communism。

(註二十九) Socialism and Freedom。

(註三十) American Democracy。

(註三十一) 韋伯與拉斯基深具同感，見Webbs: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on。

(註三十一) Catin: 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ers P. 661。

(註三十二)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 270。

(註三十四) 阿特利覆拉斯基的信

My Dear Laski, it is entirely beyond my share of life and strength to deal with all the issues which, your letter raises, in my view we ought to win the war first, and then in a free Country the issue of socialism and free enterprise can be fought out in a constitutional manner. Certainly should think it very undemocratic any one were to carry socialism during a party truce without parliamentary majority. I have always accounted you a friend rather than a follower, I think it would be a pity to break up the National unity in the war, and that I believe is the opinion of the mass of the people

(註三十五) 阿特利覆拉斯基的信中會說：工黨的策略，應以其所成爲出發點，討論將來可能成就的計劃，而不應貿然提出尚未成就的理想
“It is better to argue from what has been done to what may be done rather than to suggest that very little has been accomplished.”

(註三十六)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P.P. 92-93